

向着心中的北斗

——长征书写中的崇高之美

徐大威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红军将士历尽千难万苦完成这一举世瞩目的壮举，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从未动摇。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长征作品，依然能感受到这束信仰之光是如此耀眼。

董必武在《出发前》中回忆：“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出发时，没有人知道前面要翻越多少座雪山、穿过多少里荒无人烟的草地。可即便如此，将士们依然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路。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还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具体道路的未知，与理想信念的坚定，构成了长征书写中最意味深长的地方。今天，人们拥有越来越精密的导航工具，但知道一条路怎样走，与懂得自己为何出发，并非同一个问题。长征留给今人的思考是：当前途未卜时，我们凭借什么坚持正确方向？又凭借什么把理想走成道路？

用行动召唤未来

“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砭人肌骨，混身打着战。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好像黑色幕上缀着的宝石，它跟我们这样地接近哪！”陆定一在《老山界》里写下的这段文字，有着严峻的历史背景。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向桂北山地进发，翻越一座难走的高山：“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战士们举着火把，贴着悬崖盘绕攀登，夜间只能在狭窄的山道上歇宿，稍有差池便可能粉身碎骨。这段文字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写出了行军条件的艰苦，更在于革命者的诗意与从容。在恶劣的环境中，作者依然能欣赏到星空之美，这份从容，生长于红军将士们共同承担的历史处境之中。

长征作品中的崇高之美，正在于红军面对严峻的生存考验，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超越个人得失，以实际行动显示出的道德力量。西方经典的崇高论，从朗吉弩斯、伯克到康德，讲的多是浩瀚之物如何令人心生恐惧与敬畏，又如何在这恐惧与敬畏里，激发出人类理性的伟大。西方的崇高是观者始终身处安全距离，面对一个可以被观看的巨大对象时，所发出的赞叹。长征书写所提供的独特经验，不是隔着安全距离，不是在想象中超越危险，而是在饥饿、寒冷、战斗中承担危险。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如何抉择，如何对待战友和群众，又如何承担历史的责任……在实践和斗争中，我们看到一种别样的崇高。毛泽东《七律·长征》，将艰难的征途，化为雄浑开阔、理想浪漫的词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等闲”以精神上的坚韧、超拔，重新审视困顿的重量。词中的山河，因而具有了双重面貌，它既是需要跨越的艰难险阻，又成为革命者信仰与意志的象征。这种信仰正是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基础之上。

语言哲学对陈述与承诺有精妙的区分。所谓陈述，是以陈述事实为目的，只负责告知情况，而不必须履行义务。而承诺，则是在一个事实尚未形成时，主动给自己施加义务，作出保证和允诺。“继续前进”“一定要走出去”“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红军的这些话并非对既定事实的陈述，而是在用语言和行动，召唤一个尚未到来的未来。说者已然改变了自己与未来的关系，从身处安全距离中的旁观者，变成了置身行动的责任者。赵榕的《长征日记》记录翻越夹金山时，年过花甲的炊事班长赖有发，背着行军大锅，走到雪线时实在挪不动了，坐在雪地对战友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别浪费时间了……留点力气打鬼子去吧……我实在不行了……祝……祝……革命成功！”他不是陈述一个已经确定的结果，而是把一个尚未存在的未来，预先承诺出来。真正的信仰，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对未来的责任担当。

照亮长征道路的，不只是天上的星辰，更是由科学理论、人民立场和共同奋斗构成的精神灯塔，那是人们心中的北斗。

他者之眼的见证

为了更好地理解长征作品中的崇高之美，还可把目光延伸至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记录者。

瑞士传教士勃沙特，随军走过黔、川、湘、鄂、滇五省。尽管他始终坚守基督教信仰，但却在《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写道，“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份记录之所以有分量，恰恰是因为它出自一个立场不同、心存偏见的外国人。在漫长的共同跋涉后，勃沙特选择忠于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他写道，一名卫兵在他饥饿无力时，从过往战士那里设法要来一碗冷饭，“自己一口也没吃全让给了我”。在一段冰雪山区的行军中，骑在马上红军指战员看到勃沙特累坏了，让卫兵扶他上马前进。《神灵之手》对长征崇高精神的呈现，体现为艰险之中仍未泯灭的生命

关怀。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红军将士，随后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广为人知的《西行漫记》。斯诺对长征的肯定，不仅在于承认其军事成就，更在于赞赏红军将士在极端困境中表现出的精神力量。他指出，“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青年战士“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把烈焰”，贯穿于远征的艰难与牺牲之中。斯诺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斯诺通过访谈、观察和记录，让外部世界得以深入认识红军及其走过的道路，使红军将士在中外读者眼中成为有面容、有血肉、有理想的人。伴随着斯诺的讲述，军事上的危险与精神上的坚韧相互映照，对长征的书写也由此从军事地理和兵力部署，深入人的信仰、组织力量以及军民关系之中。

半个世纪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亲身重走了一趟长征路。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并将红军将士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视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作者在该书结尾肯定其“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索尔兹伯里注意到，长征中，许多医生自己已经体弱患病，却仍反复穿越沼泽寻找掉队者，正使这种崇高精神获得了具体的形态。他由此把长征称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认为它使人重新认识人类精神的力量。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一个76岁的老人，用自己衰弱的身体亲自感受后，得出的一个证词。

长征由此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证词结构，亲历者以生命证明自己为何出发，旁观者以良知证明自己看见了什么，后来者则以重新行走证明了这段历史——长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长征精神不断被书写

90年来，长征的历史和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书写，从亲历者的日记、诗词、回忆，到小说和纪实文学，长征书写既保存了历史，也探索怎样让后来者不断走近历史。

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将长征这条漫漫长路，比喻为一条鲜红的飘带，它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用足迹与鲜血写下的人类英雄史

诗。作品既有史笔，也有诗笔，让抽象的长征概念，变成有血有肉的故事。书中写道：“草地上没有村庄，二没有大的森林……即使没有大风，夜间的温度在夏季也达到零度左右，那是相当难熬的。说实在话，在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同志间彼此的体温，正是依靠别人的体温才能度过漫长的寒夜。”在前途迷茫、环境极端恶劣的绝境中，支撑红军走下去的，是心中那永远不灭的理想。

王树增历时6年搜集史料、走访老红军、重走长征路，完成7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该书着力书写红军将士的奋勇与信仰，写战士在绝境中如何坚守信仰，写长征精神对民众的唤醒：“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

近年来，对长征精神的重写仍在继续，并衍生出多元叙事方向，丰富了长征作品的图谱。党益民的《根据地》、李镜的《出关》、王朝柱的《延安颂》、钱林森和城光的《绝密交通线》、刁仁庆的《红色任务》、中共罗山县委宣传部的《北上：从谁家冲出发》、尹霞的《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陈伙成的《而今迈步：从头越》、刘卫和秦红的《自驾长征路》、曹敏华等的《红军故乡》、扎西措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等，从革命历史的追溯、地方记忆的发掘到当代实践的观照，既拓展了长征精神的叙事空间，也呈现出革命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经验的对话。《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也分别推出以重走长征路为线索的纪实书写、以历史物证为切入点的微观叙事、以长征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等，从不同层面延展了长征精神的文学表达。

或许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长征从来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更是一个动词，它召唤着我们用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每逢重要历史节点，总会有人重走那条路，现实中的重走、文学中的重写，一次次将历史记忆带回当下。前路未必总有现成的地图，心中却不能没有方向。那些先行者已经用足迹与生命告诉今人，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理想付诸行动，在实践中不断辨明方向，心中的北斗便能照亮脚下的道路，也能照亮通向未来的征途。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



蛭”的意愿。在春节前对待供品的态度上，艾米丽厌恶供品的气味，不敢靠近供桌，甚至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尤金发生了言语冲突。值得注意的是，牧心舅舅的身上充分展现了文化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个熟读《老子》《庄子》《墨子》的中国男性，乐于助人，遵从“天地之心”，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在众人的眼里，牧心舅舅剪掉辫子的行为有些离经叛道，但他根本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他只为自己而活。

尤金与“蛭蛭”之间的友谊，是整部作品中最让人动容的部分。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孩子，一起嬉戏打闹，在鼓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游戏是重要的润滑剂，“蛭蛭”吹树叶发出的声音能引来小鸟的回应，尤金在他的指导下也掌握了吹树叶的技能。小说中多次出现吹树叶的情节，对于尤金父子而言，这是心照不宣的共同乐趣。“眷念”是这部小说的文眼，两个在幼年时代结识的好友，虽然后来天各一方，但对彼此的惦记从未中断，这种朴素的思念藏在时光深处，散发出纯粹而真挚的人性之光。“眷念”早已超越了时空，演化成一个历久弥新、掷地有声、熠熠生辉的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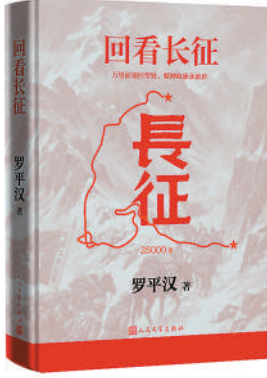
（作者系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

近日，罗平汉新著《回看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脉络为经、关键事件为纬，还原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阔征程，解读这一人间奇迹背后的信念力量与历史必然。

全书分为“从准备转移到湘江战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艰难的草地”“长征之意义”四部分，内容层层递进、逻辑紧密，勾勒出长征的缘起、转折、胜利的过程。从湘江战役的惨烈到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从通道转兵的生死抉择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从过草地的艰难险阻到北上方针的坚定执行，该书以严谨、缜密的笔触，全方位再现红军长征时的苦难与热血。

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突破国民党军封锁，付出沉重代价。作者通过翔实史料，还原了这场战役的残酷与悲壮。“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正是湘江血战留在民间记忆中的沉痛回响。四渡赤水则是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诨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人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书中用亲历者杨尚昆的话，展现毛泽东超凡的军事指挥艺术。

关于过草地的艰难，《回看长征》写道：“许多的红军战士没有牺牲在湘江渡口，没有牺牲在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和大渡河畔，也没有牺牲在老山界、乌蒙山、夹金山上，却牺牲在没有枪炮声的川西北草地。他们中，有的因缺粮而



有一种担当叫作真诚

——张冬冬《村庄无小事》读后

任启亮

张冬冬的《村庄无小事》（作家出版社）是一部长篇纪实作品，作者饱含深情地记录自己在贵州省晴隆县战马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的经历。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头扎进战马村，脚上沾满泥土、衣服顾不上洗，在山坡和田间忙碌的身影；是走进贫困户、五保户院子里查实情、聊家常、问冷暖，因工作繁重而白发渐增的中年男子；是一个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琢磨着如何让政策落地、怎么适应农村和村民的实际，为村民带来福祉的第一书记。

在这本书中，我读到的关键词是真诚。真诚，是不忘初心，与群众心在一处。为了孩子们有一个相对好一些的学习、生活环境，张冬冬想方设法为他们更换桌椅，设立战马书屋，把老师送出去培训。为了让村里老人自家产的鸡蛋能够换点零用钱，他把鸡蛋收拢起来拿到城里卖，接着又发展电商，搭建优质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为了解决部分村民出行困难，他争取支持，立项修路。担心一段刚铺好还没有干透的水泥路面被踩路，他甚至在晚间搬起小板凳坐在现场看守。民生无小事，我们从书中看到一位第一书记的尽职尽责。

真诚，是直面失败和缺点，不掩饰、不推诿，在挫折中成长。三丘田实验种植百香果，张冬冬开始以为能够为战马村走出一条产业发展、村民增收的新路。但这次实验以失败告终，他默默收拾残局，坚决履行承诺，个人承担全部费用。按说，这样一个“败走麦城”的故事不一定写进书里，但张冬冬没有掩饰自己的失败，而是举一反三进行了反思。他写道：“自己正在把一种叙事期待，提前压在尚未成熟的现实之上”“乡村振兴不是在上纸上画圈，你得理解那些不愿冒险的沉默，还得在无数次挫败中，摸索出

饿亡，有的因野菜中毒而倒下，有的因身陷泥沼而沉没，有的因草地上的突然暴雨而被冲走……这些红军战士中，有从中央苏区出发的老兵，也有一路扩红而来的新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书里写郑金煜牺牲前说“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写钟亦兵用木匠锯截肢后还坚持到陕北——这些细节之所以打动人，不是因为它们“高大上”，恰恰因为它们具体、真实、有血肉。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极限时刻做出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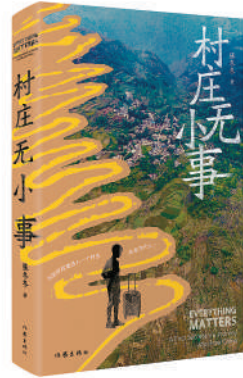
《回看长征》在探讨历史的同时，也在探讨绝境中的生存智慧与战略定力，凸显伟大长征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罗平汉谈到，《回看长征》不仅是想让我们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更让我们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那条真正属于这片泥土的生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挫折后的理性思考，风雨后的成熟和成长。

真诚，是从实际出发，讲分寸、守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多么完美的方案和良好的出发点，如果“水土不服”、不到水到渠成的地步，很难落地实施。建文化广场时万事俱备，但一户村民不愿意出让土地，张冬冬不得不忍痛放弃。正如他说：“不是你愿干、肯干、条件齐了，就一定能干成。国家的大政方针是骨架，村民的柴米油盐是血肉，而那些闲置却难以流转的土地，像夹在中间的毛细血管，看不见，却牵一发动全身。”这就是现实，反映出农村治理中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冬冬在《村庄无小事》中，记录的不只是自己挂职战马村第一书记的经历，更贯穿着对中国农村治理、农村和农民问题、扶贫开发政策目标与农村现实如何有效对接的思考。作者写道，“做群众工作，不是多承诺，而是少欠账；不是把话说圆，而是把事办成”。这不仅是他挂职期间的感悟和思考，更是管理者 and 研究者需要正视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小山的长篇小说《眷念鼓岭》（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以福建鼓岭为地理坐标，再现了一段百年前中美儿童跨越国界的深情厚谊。在小说中，“寻找”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动力，决定了小说的情节走向。小说着重讲述了主人公尤金的三次寻找，延续了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和章回体小说中“三”的叙事模式。第四章《鼓岭的孩子》中，尤金在好友“蛭蛭”的帮助下学会了爬树，一次趁父母午睡后，他偷偷爬上柳杉王，在树冠里睡着了。父亲乔治和母亲爱米丽发现儿子不在家中，四处寻找，终于在树上找到了尤金。这次事件将孩子爱玩的天性展露无遗，哪怕明知会招来父母的责骂，孩子们依旧乐此不疲。

在第七章《狮子和中国结》中，

藏在时光深处的思念

——评小山长篇小说《眷念鼓岭》

周 聪

乔治夫妇在中国全力帮助的女孩黄绿带着尤金前往天安山，尤金独自跑进了一条胡同，慌乱中两人走散了。黄绿连忙返回告诉尤金父母，经过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耐心寻找，在公墓那儿发现了尤金。“走丢”源自好奇心，面对陌生环境，尤金内心的新鲜感很快便转化成焦虑、无助、茫然。在第八章《节日，节日》中，新年将至，围绕着供品等风俗，尤金与母亲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分歧，他一气之下跑入雾气中。在柳杉王旁边，尤金与雾孩子展开了对话。父母发现尤金不见了，满心焦虑，他们来到柳杉王处，没有找到尤金的身影，牧心舅舅加入寻找尤金的队伍，他们在去嘉湖的路上找到了尤金。尤金去往的三处地点，颇有深意：柳杉王是当地居民心目中的神树，为众人祈福之地；公墓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暗示人的终极去向；遇见雾孩子后去往嘉湖，这是一条充满偶然性与象征意味的旅途。

事实上，第十一章《海浪声声》

与第十二章《写给天堂的信》的主题也是“寻找”，时隔多年后，尤金的妻子伊丽莎白以重返鼓岭的方式，见到了丈夫心心念念的好人“蛭蛭”，找到了丈夫在中国生活过的痕迹，她真正地走进了丈夫的精神世界，五封信是她最深情的告白。作者有意拉长了小说的时空跨度，以伊丽莎白的视角来观照尤金与“蛭蛭”的友情。历经岁月的淘洗，这段跨国的情谊更显弥足珍贵。此外，在行文中，作者有意增加了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这些陈述性的文字为作品平添了一分真实感。

在《眷念鼓岭》中，东西方的文化冲突碰撞时有发生。乔治夫妇去往“蛭蛭”家寻找尤金，爱米丽因说话方式遭到了“蛭蛭”父亲的抵触与冷落，表面上看，这是言语或者礼节之间的不同，实则隐含了深层的文化差异。再如，在对待辫子这件事上，爱米丽认为“蛭蛭”不讲卫生，他应该剪去辫子，尤金觉得应该尊重“蛭